

元代儒者价值观念中的“我”与“为我” ——吴澄真儒观探析

吴立群

(上海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上海 200044)

[摘要] 在元代,儒者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变化可从其核心的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的变化中得到说明。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面对元代儒者所面临的价值危机,一方面以“承继道统”明确元代儒者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以“内圣外王”规定元代儒者的利益意识,为元代儒者重新树立了“真儒”这一价值目标,肯定了元代儒者的人格自尊与价值自觉。

[关键词] “我”; “为我”; 吴澄; 真儒观

[中图分类号] B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2-0009-05

价值观念是指人们关于基本价值的观念系统,是主体“价值意识活动积淀的结果”^{[1]145}。所谓价值是指一种关系现象,即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主客体关系,是“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质和程度”^{[2]79}。“价值的本质在于马克思所说的‘为我而存在的关系’”^{[1]149},“为我关系在本质上就是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关系。因而,为我关系也就是价值关系。”^{[3]2}。在价值关系中,“我”与“为我”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两个部分。“我”即主体,“为我”即建构或获取利益。“我”和“为我”就成为构建“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活动的两个核心^{[1]150}。

“价值观念具有结构,价值观念的变化源自价值观念结构中核心价值意识的变化”^{[1]13}。马克思的“为我关系”说为我们理解价值观念结构中的核心价值意识提供了根据^{[1]13}。与构建“为我关系”活动中的两个核心“我”和“为我”相对应的就是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1]151}。“价值观念可以形象地理解为以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为焦点所形成的椭圆。主体意识不同,利益意识不同,价值观念的本质规定也就不同。”^{[1]14-17}元代儒者价值观念的变化可以从作为其核心的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的变化中得到说明。

一 元代儒者价值观念的变化

历代儒者的价值目标是“替君行道”,认为自己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追求与实施“道”的责任。“志于道”是儒者对自身社会角色、社会责任的定位,是对自身价值实现途径的确认。也就是说,“我”是谁?“我”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从来都是确定的、不变的。儒者的主体意识历来非常明确。在这一清晰的自我定位意识下,儒者的“为我”建构也就围绕着“修”、“齐”、“治”、“平”而展开。“学而优则仕”则成为激励儒者践履“内圣外王”的利益意识。“我”在构建“为我关系”活动中,形成了儒家仁义道德的价值体系,其核心价值观念即“仁”与“礼”。“仁”为社会个体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礼”为社会群体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仁”与“礼”的思想构成儒家“三纲五常”的基本框架,历代儒者莫不以此作为自己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准则。

在元代社会,儒者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元王朝是由多民族所形成的国家。元朝民众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在任用官吏、法律地位、科举名额和待遇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等方面都有种种不平等规定。生活在蒙元统治下的汉人儒者,当“志于道”的价值理想与“不事二主”的伦理纲常发生激烈冲突时,“我”是谁?“我”与社会的关系如

[收稿日期] 2010-01-07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价值论视域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资助(编号:08AZX005)。

[作者简介] 吴立群(1968-),女,江西崇仁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何?这一问题变得难以回答。换言之,儒者对自我定位失去了方向,主体意识变得模糊;与此同时,元代科举的废止,堵塞了儒者进身之路,“入仕无门”又使得“学而优则仕”这一利益意识变得虚无缥缈。这样,“君子儒”这一理想人格在元代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吴澄是元代著名理学家,与许衡同为元代大儒,享有盛名,有“南吴北许”^{[4] 945}之称。吴澄生活在蒙元统治下的中国。对当时亡国之痛、生民之苦、陆沉之悲感同身受,亦对儒者未得一展胸襟之无奈深有契合。蒙元于汉族而言属于夷狄蛮貉。如何在夷狄蛮貉入主之时保存中原固有的文明,是那个时代汉族儒者为之焦虑的问题。当元之世,江山易帜,斯人斯道正渐趋衰微殆尽。儒者在“志于道”^{[5] 67}这个问题上,比平时遇到的矛盾更加严重,在如何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的考虑上更加复杂。吴澄面对元代儒者所遭遇的价值危机,对元代儒者的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重新进行定位,对“君子儒”这一理想人格进行了新的诠释。

二 主体意识的变化:从“志于道”到“承继道统”

作为儒家价值理想的实践主体,“儒”的概念由来已久。先秦时,“儒”在较狭隘,但又较确定的意义上,被理解为特指为孔子所开创的,以尊崇尧舜、提倡仁义为特色的一个思想学术派别。孔子作为儒家的奠基人,一生诲人不倦,以“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5] 59}为教育宗旨。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做“君子儒”^{[5] 59},以“天下归仁”^{[5] 131}为己任。《论语》载: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耒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5] 223}。

孔子认为,“志于道”^{[5] 67}乃儒者天赋使命。所谓“知天命”^{[5] 10}即对天赋之德、天赋使命的自觉。在实现天赋之德和履行天赋使命问题上,孔子反对任何苟且偷安。在他看来,具有使命感的人会超越自我,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以经世济时为天职。历代儒者皆以孔子所述“君子儒”为宗。

然而,元朝儒士大部分来自宋、金旧臣,他们无法回避一个两难的局面。“志于道”的宏伟理想与“不事二主”的伦理纲常矛盾异常尖锐。元朝社会的多元化、统治者态度的反复、行汉法的曲折、科举

制度的中断,加之在思想观念、道德准则等方面所受到的冲击,使得元代儒者的心态微妙复杂。“我”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我的权利、责任和归宿是什么?作为价值观念的核心与灵魂的主体意识在元代儒者那里无法确立。有鉴于此,吴澄以“承继道统”对“志于道”重新阐释。

吴澄认为,发扬微而不显之道统是元代儒者的天赋使命。儒家道统说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个圣人以道相传的谱系。道统中上古时期的圣人,包括伏羲、尧、舜、汤、文、武、周公等,均为中国人非常崇扬的圣君,亦为中华文化的创造、传承者。因此,只要与他们联系起来,便能确立自身的正统地位。吴澄以儒家道统为正统,建构了自朱熹之后最完整的道统传承谱系。圣人之道经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高辛、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司马光、张载、朱熹、张栻、吕祖谦、许衡以及吴澄本人的传授,得以流传推广^{[4] 506-507}。吴澄把道统的发展过程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阶段,每一阶段又分为元、亨、利、贞四个小段。值得注意的是,吴澄将近古时期从周敦颐、到朱熹,按元、亨、利、贞排列,将朱熹置于“利”,而不是终结的“贞”。显然,在吴澄的道统图中,“贞”应由元代儒者来终结,而这位元代儒者正是吴澄本人。在这里,吴澄当仁不让,以道自任,不仅表现出吴澄的学术自信,更表现出作为元代大儒所具有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

吴澄以道自任,以“承继道统”对“志于道”重新阐释,其目的是希望藉此说明:元代儒者虽然无法直接以“替君行道”的方式来实现“志于道”的理想,但是却仍然可以通过继承儒家道统这样一种间接的方式来实现“志于道”的理想。这样,“我”是谁?“我”与社会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就有了一个答案:“我”仍然是“儒”。“承继道统”的自我定位为元代儒者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三 利益意识的变化:从“学而优则仕”到“内圣外王”

在儒家思想中,虽然重义轻利是基本的价值观念,但是富与贵并不是儒家所摒弃的人生目标。相反,通过“学而优则仕”而获得的富与贵,是儒家所倡导、所追求的。儒家由己及人,由个人的德性修养到建功立业的入世过程中,既充满着责任感、义务感,同时又具有物质功利的动力。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5] 71}“学”与“禄”、

“仕”历来紧密联系。“仕”历来作为众多儒者毕生的利益追求,而科举制度则是获取这一利益的直接而有效的载体。但是,在现实生活领域,儒者赖以踏上外王之路的科举途径却在长达八十年中被废止,这对元代儒者是致命的打击。即使在恢复科举之时,科举入仕在元代仍是最萧条的一途。在异族统治下,元代汉族儒者感到沉重的政治压力,很难实现“外王”,尤其在科举废止以后,元代儒者开始普遍认识到这一外部世界是极难改造的。“学而优则仕”这一利益意识在元代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此时,吴澄提出以“内圣外王”取代“仕”作为儒者价值观念中的利益意识,并以“博文约礼”与“豪杰之士”阐发自己对“内圣外王”的理解。吴澄认为儒者获取自身利益并非惟有入仕一途。儒者以“博文约礼”、“志”于道求“内圣”;以处而讲学、行道救世谋“外王”,同样可以获取自身的利益,并且,在吴澄看来,“内圣外王”才是儒者所应追求的最高利益。就内圣而言,吴澄首先从儒家为学的目的与动机谈起。吴澄认为,元代儒者的为学之方,即所谓“今之学”,与“古之学”有着天壤之别。在吴澄看来,“古之学”与“今之学”之不同在于“为人”与“为己”的差别。《论语》载:“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5] 189};“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5] 1};“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5] 173};“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5] 35}。《论语》中的典型表述体现了“为己之学”的特点。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得到他人的肯定、赞扬,更不在于身处高位,而在于他在自省时,对自身感到满意,即所谓“内省不疚”^{[5] 133}。努力使自己成为君子是为己之学的宏伟目标。陆九渊曾应朱熹之邀,在白鹿洞书院作过一次关于“义利之辨”的演讲。按照陆九渊的说法,“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不在于行为,而在于“志”。人们的行为可能相同,但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其意义并不相同。即各人的“志”并不相同。这种不同的意义正是各个人的不同境界的体现。一个人的行为出于“公”的境界,则为“君子”;一个人的行为出于“私”心,则为“小人”。吴澄非常赞同陆九渊以“义”、“利”言为己、“为人”的说法,认为陆九渊之说“有以切中学者之病也。”^{[4] 88}

依吴澄之见,一个人志在“为道”或“求道”,未必不可以“求知”,因为他把“求知”仅仅作为实现精神境界的手段。而如果一个人的“志”不在此,那么,他仅仅是“求知”而已,与精神境界无关。因此,在吴澄看来,自身价值的实现不在于他人的肯定与赞扬,也不在于其社会地位的高下,而在于一个人的

“志”。元代儒者只要“志”在求道,就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可以成就“内圣”。人最为天下贵,成就自己为“人”,成就了“内圣”,也就获取了最大的自身利益。修己的根本目的就是使自己达到做人的标准,并进而成为君子和圣人,而成为君子、成为圣人是儒者的最高利益所在。

就外王而言,元代儒者入“仕”无门又如何成就“外王”呢?吴澄以处而讲学、笃行儒道作为成就“外王”的新途径。吴澄曾引《论语》中漆雕开不仕一例,表明“仕”非己所愿。吴澄的不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当时儒者“苟求苟得”、钻营投机的不齿,自拔于流俗。尽管吴澄对儒者苟求以仕的行为深恶痛绝,但他并非一味地反对功名之求,而是将“天爵”视为更高的追求。吴澄认为,希望尊贵是人们的共同心理。尊贵有两种:一种人品德高尚,受人尊重,孟子称其为“天爵”;一种是达官显贵的尊贵,孟子称其为“人爵”。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也;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4] 173}孟子主张由“天爵”(仁义道德)生“人爵”(公卿禄位)。孔子亦云:“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5] 92}在吴澄看来,先儒所谓“学而优则仕”,并未将“仕”作为“为学”之目的,而是作为“为道”之方式与途径。因此,“仕”并非儒者实现“外王”的唯一门径。儒者只有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才能根本改变“世以儒为无用”的状况,“使人知儒者之所为果非常人所可及,亦使用人者知其不用之人,未必皆劣于其所用者也。”^{[4] 131}

吴澄认为,在“世胄躐高位,英俊沈下僚”^{[6] 993}的现实境况下,儒者更应努力保持自身人格的尊严与独立,加强自我修为,自尊自爱,通过博文约礼、笃行儒道的方式同样可以成就“内圣外王”,而成就“内圣外王”乃“为道”之根本目的,亦为儒者之最高利益。“仕”乃“为道”之途径,但并非唯一途径。儒家的价值体系中向来有“为学”与“为道”的区别。“为学”的目的是要增长人的知识,而“为道”则是为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仕”这一利益载体被阻断,“学而优则仕”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吴澄通过对“为学”、“为道”的阐发,表明“学而优则仕”只是“为道”的途径,并非“为道”之目的。因此,世儒不必舍本逐末,“苟求苟得”,以“仕”之小利失“为道”之大利。这样,吴澄将儒者的利益意识这一“椭圆”中的另一个“焦点”就定位在“内圣外王”上。

四 元代儒者价值观念的重新树立:真儒

前已论及,“仁”与“礼”共同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这一价值观念所内蕴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必然在儒者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同时也决定了儒者实践活动中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①。儒家以兼有伦理性、功利性的“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在元代,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低落了下来。究其原因,在于对于“我”是谁?“我”与社会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发生了变化。一个失去自我定位的“我”在构建“为我关系”活动中必然感到迷茫与无所适从。当“我”发生变化时,“为我”亦随之发生变化。换言之,构成儒者价值观念这一“椭圆”中的两个“焦点”(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发生了变化,因而价值观念的本质规定也就无法明确^②。在价值观念中“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之间形成一定的联系,价值观念中的深层结构就是以这两个核心意识为焦点所形成的椭圆。——椭圆的变化和运动可以从作为焦点的两个核心之间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张力的变化和运动中得到说明。”^{[1] 151}由此可揭示元代儒者遭遇价值危机的深层原因,并通过对吴澄重新树立元代儒者价值观念过程的思考,分析吴澄真儒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内涵特征。

其一,“我”的重新确立。在价值关系中,“我”即主体。价值主体确立自己价值观念的第一个基础,是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地位和使命的认识与定位^③。历代儒者的价值目标是“替君行道”。儒者价值观念中的主体意识是博施济众、以“天下归仁”为己任的“君子儒”。在元朝,这一主体意识发生了变化。元朝初年,便流传有“九儒十丐”之说。汉儒入仕之难引起许多士大夫的不满,时人陈高在其《感兴》篇中哀叹道:“如何穷巷士,埋首书卷间,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7] 138}这确实是当时汉人儒者境遇的写照。针对这一情况,吴澄从“志于道”这一儒者传统理想出发,对“儒”的含义进行了新的阐释。他认为,只要能够承继道统,同样能够实现儒者“志于道”的理想。我们看到,吴澄是怀着一种忧患意识去思考、探究儒者的主体意识问题,而深沉的忧患意识正是儒者精神的写照。在道统说中,吴澄将理学置于道统传授中“贞”的最高位置,树立了理学在元代的现实地位。在艰难的现实环境中,吴澄通过肯定元代儒者承继道统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为身处艰难环境中的儒者树立以“道”自任的担当意识。在对元代儒者以继道统自任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论证中,元代儒者的主体意识得以明确:“我”是

“儒”,“我”的社会责任是承继道统。吴澄以“真儒”来指称承继道统之“儒”。

其二,“为我”的重新建构。“利益意识的变化不是指有无关于利益追求意识的变化,而是在利益追求过程中,由于利益载体变化而引起的利益意识的变化。”^{[1] 15}儒者“志于道”的宏伟理想需要通过政治制度才能实现,自隋唐时起,科举制度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具有代表性的选官制度,成为儒者“志于道”的利益载体。然而在元代,八十年的不开科举打碎了所有儒者的幻想和期待。门第寒微的汉族儒者,仕途无门。“学而优则仕”的“为我”建构活动受到阻碍。针对这一情况,吴澄从儒者“志于道”的理想出发,对“仕”作了新的阐释。“志于道”的理想决定了儒者在构建价值的活动中,虽然追求着以“仕”为中介的利益,但就最终目标而言,是要达到“天下归仁”。这一最终目标必然要在构建“为我而存在的关系”的活动中反映出来,从而也就必然要在利益意识的变化中反映出来。吴澄从儒者的最终目标出发,对“内圣外王”加以深入阐发。儒家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认识、征服世界,亦非把人自身作为对象化的认知客体,而主要是充实主体自我的精神世界,完善自我和实现自我。儒家把“修己以安人”及“修己以安百姓”作为对圣贤人格的界定。“修己”即个人的道德修养,成就圣贤人格。“安人”和“安百姓”指政治实践,以建功立业。圣人不仅是自我超越的精神圣人,而且是能博施济众的世俗圣人。《易传》把“崇德广业”作为内圣外王之道。“崇德”即提高道德境界,“广业”即济世利民。《大学》主张由“内圣”而“外王”,亦即要求把个人的道德修养拓展到治国平天下的领域。因而,成就“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是历代儒者的共同追求,元代儒者无疑承续了这一传统。通过对“内圣外王”的阐发,吴澄希望藉此说明:“仕”只是作为获取利益的一个中介而已,并非儒者的最终利益,“内圣外王”才是“真儒”的最高利益。

这样,在将主体意识明确为“承继道统”,利益意识规定为“内圣外王”之后,元代儒者的价值观念才得以重新树立。吴澄以“真儒”作为元代儒者的价值目标,具有如下规定:首先,“真儒”能够承继儒家道统。吴澄认为,孔子“文不在兹乎?”之“文”并非“博文”之“文”,而是儒家一脉相承之“道”。在“文”与“道”之间,吴澄强调的是“道”。吴澄把秦汉至宋这一时期视为道统之中断。他认为,汉唐诸儒沉溺注疏训诂,致使“道丧而文亦弊”,“孔道之传不续”^{[4] 395}。因此,汉唐诸儒不可谓之“真儒”。在

吴澄看来,“道”是“真儒”的生存意义与生命价值。元代儒者可以通过承继道统,亦即“志于道”来实现自身的生存意义与生命价值。其次,“真儒”乃“内圣”与“外王”之统一。在吴澄看来,历来受世人尊重的儒者,如今为“小夫贱隶”所不耻,这与儒者自身所作所为不无关系。他说:“近年习俗日颓,儒者不免苟求苟得,钻刺百端,媚宠乞窬,不以为羞,舐痔尝粪,何所不至。”^{[4][13]}吴澄对儒者苟求以仕的行为深恶痛绝。他认为,在艰难的现实环境中,儒者更应保持自身人格的尊严与独立。在吴澄的儒者理想人格中,虽然并没有忽视“外王”,但其重心仍落在“内圣”之挺立处,以德行而开出价值之明,开出真实生命之光,突出了儒者的主体精神。儒家“君子儒”的理想人格得到了重新全面的肯定。

成就“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是历代儒者的共同追求。在元代,儒者却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困境:一方面,在异族统治下,汉族儒士感到沉重的政治压力,很难实现“外王”。尤其在科举废止以后,理学家们开始普遍认识到这一“外部”世界是极难改造的;另一方面,宋元之际,战争频仍。战乱中,世风日下,儒家传统道德沦丧。吴澄作为元代大儒,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其真儒观凸显了儒者理想人格的追求,树立起元代儒者追求和顺承外在于个人的、社会性目标的勇气。吴澄所谓“真儒”既可承继儒家道统,又能内圣与外王兼修。这一理想人格的树立肯定了元代儒者的生存意义与生命价值,为元代儒者的精神追求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支柱。

注释:

①陈新汉教授认为:“价值观念所内蕴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必然在社会群体主体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社会价值观念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社会群体主体评价活动和认知活动中的价

值追求和价值取向。”“社会价值观念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社会群体主体实践活动中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参见陈新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论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66-167.

②陈新汉教授认为:“可以形象地把价值观念理解为以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为焦点所形成的椭圆。主体意识不同,利益意识不同,价值观念的本质规定也就不同。”参见陈新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论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4-17.

③李德顺教授认为:“构成任何一种价值观念的第|个基础,都是确立价值主体;而每|价值主体确立自己价值观念的第|个基础,则是要充分认识自己的社会角色、地位和使命,包括责、权、利的定位。”参见李德顺. 价值论(第2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211.

参考文献

- [1] 陈新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价值论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2] 李德顺. 价值论(第2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3] 陈新汉. 评价论导论—认识论的|个新领域[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 [4] 吴澄. 吴文正集.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5] 金良年. 论语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6] [唐]欧阳询. 艺文类聚(上)卷五十五[M]. 汪绍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7] [元]陈高. 不系舟渔集卷三,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6册[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I” and “For Me” in Ideological Level of Value of Yuan Dynasty Confucians

— study in g Wu Chen's point of view on genuine Confucian

WU Li-qun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44 China)

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value of Yuan Dynasty Confucians changed greatly. It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change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benefit consciousness. Facing to the value crisis of Confucians, Wu Chen, the famous philosopher of Yuan Dynasty, nailed down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by inheriting Confucian tradition, in the meantime, ordained the benefit consciousness by inner sageliness and outer kingliness. Wu Chen's point of view on genuine Confucian had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hancing the spirit of Confucian in Yuan Dynasty.

Key words I For Me, Wu Chen, point of view on genuine Confucian